



徐霞客研究

第24辑

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
江阴市人民政府编

地质出版社

徐霞客研究

第24辑

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
江 阴 市 人 民 政 府 编

地质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霞客研究. 第24辑 / 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 江阴市人民政府编.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116-07773-7

I. ①徐… II. ①中… ②江… III. ①徐霞客
(1586~1641)—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7978号

责任编辑: 郭松 唐芝
责任校对: 张冬
出版发行: 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1号, 100083
电话: (010) 82324587 (编辑部); (010) 82324508 (邮购部)
网址: <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 zbs@gph.com.cn
传真: (010) 82318613
印刷: 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75 图版: 2面
字数: 239千字
印数: 1—2500册
版次: 2012年7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书号: ISBN 978-7-116-07773-7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 敬请致电本社; 如本书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徐霞客研究》编委会

顾	问	侯仁之		
编委会	主任	江牧岳		
副	主 任	黄 实	姚秉忠	于希贤
		艾 若	林国志	袁秋中
		陈捷元	苏士虎	王建炜
		陈 楠		
主	编	姚秉忠		
副	主 编	汤家厚	高松凡	龚法忠
		田 柳	唐汉章	
编	委	芦秀娥	任小玫	刘瑞升

目 录

特 稿

江牧岳同志生平	中国日报社	1
怀念家父江牧岳	江北晨执笔	4
二十年难忘岁月	黄 实	6
改革开放初期于光远与徐学	施光华	23

专 论

徐霞客旅游境界论略	陈庆江	26
“中国旅游日”设立的“徐学”源流及里程碑意义	郑祖安	39
波罗、霞客相辉映 意、中文化一千秋	蔡伯仁 冯荷颖	45
明代临海奇才陈函辉	丁式贤	53
徐霞客“万里遐征”的艰难历程及其人际交往	胡积德	62
麋鹿呦呦背后的生态美学思考	任小玫	71
浅谈永续旅游	陶翼煌	80
秉母志与克继其绪	缪正西	86
两条相向而行的斜线	庄月江	96
师法游圣典范 提振旅游发展	龚法忠	104
徐霞客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和启示	薛仲良	112
《徐霞客游记》的环境史价值	王玉德 赵秀琴	118
从衡游看徐霞客的人格魅力	谭民政	125
徐霞客与李旭旦	杭建伟	131

考证

徐霞客与吴荅臣、陈平人	张兴华	137
徐霞客元妻许氏家世考	陈锡良	143

人物

关注徐学一风范	田 柳	151
徐学理念 垂启后学	蔡伯仁	155
忘却不了的永恒笑脸	唐汉章	161
缅怀徐学前辈江牧岳先生	张炳德	168
致江牧岳老的一封信	刘瑞升	172
最是那紧紧握着的手——忆江老	任小玫	175
忆江老	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	181
良操美德千秋在	姚秉忠	183

争鸣

霞客归程商榷之再商榷	杨长坤	189
------------------	-----	-----

交流

国际文化交流的奇葩	林洁洁 邓淦玮	197
根植于沃土的希望	张苏姝	199
昆明市徐霞客小学学生学习徐霞客习作	张楚阳 冉晓辉 李金蔚	209
在新课程三维目标理念下解读徐霞客	杨晓峰	212

行者

在九峰三泖间寻觅	沈龙法	215
徐霞客过安顺	丁武光	227

秋色中的山居庵	肖卫琴	236
---------------	-----	-----

诗 文

徐霞客“试浙江潮”古韵与潮文化链接	高健行	242
诗五首	蔡伯仁	247
诗二首	何公慰	249
徐霞客赋	谭为宜	251

书 林

徐学界的“徐霞客”	刘汉俊	252
人间亦有痴如我	曹立波	258
为了纪念 为了鞭策	刘瑞升	262
《海外徐霞客研究概览》序	张宏仁	264
《海外徐霞客研究概览》后记	汤家厚 任小玫	265
一部尚未多见的世界徐学輿情资料	慕容霞	267

特稿

江牧岳同志生平

中国日报社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优秀领导干部，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日报社原社长江牧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月24日4时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江牧岳同志，原名蒋桂锐，曾用名蒋慕岳，1915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蓬安县。1932年考入四川嘉陵高中。青少年时期，他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四川各界救国会常委、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部委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办《星芒报》，任成都星芒社党支部书记、中共成都市文委成员。他积极组织、尽心尽责，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派的各项任务。

1938年冬，江牧岳同志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地新闻服务队第一支队负责人，他带领同志们积极为成都各报撰写战地新闻，宣传联合抗日。1940年至1943年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总干事，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通联科科长，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编委。1943年秋任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1946年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同年11月任冀南日报副社长、新华社冀南分社社长。1948年任新华社中原总分社豫西分社副社长，同年秋任桐柏日报、桐柏分社社长。在当时通讯系统不健全、地方稿件匮乏的情况下，他加强理论学习，准确把握政

策，组织优秀稿件，提升了稿件的数量与质量。工作期间，他按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通过新闻报道工作，为扩大党的影响、弘扬党的理念、推动党的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秋至1954年，江牧岳同志历任中南工人日报社社长，中南总工会常委、文教部部长、秘书长。1954年秋至1957年秋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他考虑问题全面客观，从实际出发，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环节和重点问题，妥善安排，有效实施，不断创新，扩大了工作成果，弘扬了时代新风。

1957年秋，江牧岳同志任浙江日报社社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1960年秋至1962年秋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62年11月至1963年7月任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反对浮夸，主张实事求是。在学校任职期间，他紧抓教学、注重实效、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善于通过细致调研谨慎稳妥地处理问题，高质量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广大师生的赞誉，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63年，江牧岳同志任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劳动，1973年恢复组织生活和工作。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9年，江牧岳同志调到人民日报社担任英文日报（即中国日报）筹备组负责人。虽已年过六旬，但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一全新的事业中，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带领筹备小组构建班子、确定方针，网罗人才、搭建队伍，广泛调研。在他和筹备组的努力下，中国日报于1981年6月1日正式创刊，为日后中国日报事业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国家对外传播事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1年中国日报社成立后，江牧岳同志任中国日报社社长，1983年4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1984年7月任中国日报社顾问。江牧岳同志组织领导能力出众，新闻工作经验丰富。他认真领会党和国家政策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密切关注国内外受众的实际需求，善于借鉴中外媒体先进经

验，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不断提升报社的新闻宣传、内部建设和改革发展等工作水平。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谦和友善、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作风民主，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人，能够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报社员工的爱戴和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江牧岳同志在1986年12月离休后，依然关心国家和报社的事业发展，坚持读书看报，关注新闻时政，积极为报社的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江牧岳同志曾任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徐霞客研究》编委会主任，先后主持出版了18辑《徐霞客研究》。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他组织策划了许多徐霞客研究、纪念活动，为社会作出了奉献。

江牧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奋斗的一生。从早年投身革命、从事新闻工作开始，他始终坚持革命信念，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刻苦学习并积极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结合，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带领、引导一批批新闻工作者为国家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江牧岳同志的逝世，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和新闻战线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我们深切悼念江牧岳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和继承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优秀品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传统，开拓创新，团结一致，积极进取，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江牧岳同志永垂不朽！

怀念家父江牧岳

江北晨执笔

家父江牧岳，原名蒋桂锐，曾用名蒋慕岳，1915年11月出生
于四川省蓬安县。

家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追随者，1936年参加革命。如他的
生平记述，1938年在成都主办《星芒报》，其时的志同道合者有
胡绩伟、熊复、田家英等人。田家英在20世纪60年代是毛泽东的
政治秘书，于文化大革命前夜主动辞世，有人曾归因于文人的敏
感或良知未泯，实情他人无从知晓，但蜀人刚烈的性格隐约可
见；胡绩伟，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当时
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熊复，是同时期《红旗》杂志总
编辑，是那时思想正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家父与胡、熊二人皆
为好友，足见家父之胸怀，此宽广包容源于他对战友的忠诚和
爱，体现为贯穿他一生对友情的执著追求。

家父洞悉人生，但不工于心计，崇尚简单。笔者年轻时喜欢
写长篇大论，使用复杂的词句，家父评价是“老太婆的裹脚布，
又臭又长”。笔者决心痛改前非，每天写一篇四百字小文，蓝笔
写，红笔改，直至不能再减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为止。在这个
过程中，理解了家父写文章的宗旨：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但直
白讲真话的文章有时也会带来麻烦。

1959年，周恩来总理召集南方数省有关农业的干部，表示对
1958年大跃进时期粮食亩产量万斤“高产”的质疑。家父为此写
了一篇文章《合理密植，科学种田》，文中讲他在试验田精工细
作，水稻的亩产也只有数百斤，意指亩产万斤以上是绝无可能。
他时为《浙江日报》社长，因此以社论的形式将文章刊发在头
版。此事很快导致了家父被解除《浙江日报》社长的职务。

这是家父第二次遭到大的“挨整”。1942年的“整风运动”

中第一次“挨整”，“文化大革命”中又“挨整”。尽管不停地“挨整”，他却始终乐观豁达，喜欢交际，喜欢宴请，喜欢热闹。家父的吃，不追求山珍海味，爱好的多是市井小吃，如担担面、红烧肉、蛋炒饭一类；他喜欢自己动手，更喜欢邀众多朋友来聚会品尝。他是活在当下的身体力行者。

“挨整”而不愤恨，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中，家父第三次“挨整”，缘由之一是“假党员”，意为混入共产党的坏人，“证据”是20世纪30年代四川地下党一位负责人的证词，大意是作为当时的负责人他不记得家父曾加入共产党。20世纪70年代初期，家父为此给周恩来写了封申诉信，信中谈及这证词时用了四个字“胡说八道！”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愤怒时刻。除此以外，就笔者所知，他几乎没有抱怨过什么，总是以宽厚仁慈之心待人处事。

笔者曾向家父谈及自己身体不好，精神不济，做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家父问：你今年多大？答：半百。家父微笑：你是正当年！健康不是一种数字，健康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行为方式。这就是家父的理解。

有一幅家父“笑”的照片，不知何人所摄，摆在家中多年。笑分多种，有大笑、微笑、含蓄的笑、似笑非笑、矜持的笑、神秘的笑，等等。家父的“笑”是那种“没心没肺”的笑，这是笑的极致。在这种笑意中，他的信心从未丧失过，始终像春风初起时一样的清新。

江北晨执笔
代表江然、江红、江杭生
2012年初于北京

二十年难忘岁月

——缅怀江老

黄实

最后的聚会和告别

龙年正月初二晚10时许，电话铃声响起，话筒里传来江老公子杭生的声音：“黄叔，父亲走了！今晨零时后……”话音时断时续。我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好。不出意料，江老果然没有扛到正月十五他97岁生日，离开大家，走了。

此时，电视荧屏上正在播出北京卫视台《环球春晚》的画面，欢声笑语，弥漫斗室。窗台花盆里的水仙花与墙角花盆里的冬季牡丹花竞相开放，吐露微微清香。一位朝夕相处了20年、可亲可敬的长者，度过了他近一个世纪风风雨雨岁月，离开了他所眷恋的这个世界，远行了，永远不回来了！虽然年近百岁的世纪老人，事业有成，儿孙满堂，按世俗说是圆满人生了。但我想，他老人家并非心甘情愿离开这个绮丽奇妙的世界，不然，他为什么在病床上与病魔抗争了一年又10个月的光阴！

江老于2010年3月24日住进协和医院。这之前5天，即3月20日，几位经常围绕在他身边的友人和晚辈，在万寿路他寓所，与他共同度过了他95岁生日。江老一向低调，事前与他商量，拟多邀请几位故友新识，在邻近饭店包3桌为他祝寿，却被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几经商议，不在饭店包桌祝寿，只邀少数日常接近的友人到他家聚聚。他扛不过我苦苦劝说，终于同意了这后一方案。其实，早在5年前，江老90大寿时，他就坚决反对张罗为他祝寿。结果，那时只通知部分好友在他家举行了小型迎春茶话会。那次赴约的人有二三十位，有人似乎早知是他90大寿祝贺活动，

便心照不宣地送来美酒与鲜花。而这次参加的却只有10来人，原先拟定的名单删去了一大半。当天前往祝寿的有尹立、韩维、林国志、曾俊伟及夫人、芦秀娥、任小玫、刘瑞升、车玲、谢小玲、汤家厚和我（艾若老去外地了，林国志夫人林应华因脚疾未参加）。因这是江老生前与大家最后一次聚会，还是把与会的名单列存于此，以兹纪念。

那天，大家事前订制了一个大蛋糕，老林和我分别题写了祝贺条幅，尹立、曾老夫妇、车玲等送上红酒，韩维到得最迟，但却送上一大束鲜花，还特意穿了过年订制的新装。祝寿活动简朴而热烈，切蛋糕、祝酒、照相。临告别时，大家祝江老长命百岁。江老好似也很有信心活到百岁，微微向大家招手致谢。末了，韩维添上了一句：“百岁大寿时，大家再来祝寿。”

没有料到，一周后杭生突然电话告知，江老因肺炎已于24日急送医院，并住进特别监护室。后来，从江老身边服务的保姆小陈处得知，原来就在我们为江老祝寿的第二天，江老如往常一样，让保姆推轮椅陪他到楼下散步时，因天气寒冷，回家就流清鼻涕；当晚卧室窗门又没关严，受凉感冒了！送进医院病情加重转为肺炎，当晚就住进重病监护室，还一度休克。过了两天，我赶到协和医院。等到下午3时，我穿上白大褂走入ICU，只见江老躺在特制的病床上，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周边布满各种医疗仪器。他本人则呈昏迷状态。护士替我呼唤他。他微微地睁开眼，迷茫地望着我，很快又闭上眼昏过去了。护士说，这还是他两天来第一次睁眼。我简直不敢相信，才几天时间，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就成了这个状态！可巧，这时江老又微微睁开眼，深情地望着我，似乎想举手向我示意，但他的手脚被纱布条捆绑着，无法活动。我不知所措，大约说了些慰勉的话，但究竟说了些什么，现在已想不清了。此时，护士通知我，室外又有家属等候探视，要我抓紧离开，否则探视时间就过了。我只好悻悻然脱了白大褂离开ICU。原来是江老二公子北晨，我与北晨交谈了几句，见他进ICU才慢慢离开医院。当天我是怎样走回家的，现在也记不清了。

一路上，脑子里反复出现大家为江老祝寿的画面以及他全身插上管子的画面。这些画面印象之深，以致此刻写这篇文章时，又反反复复出现。

此后，每隔几天，我都到医院去一次。幸而很快江老的病情就有所缓解，不久就从ICU迁住普通病房。他的意识也逐渐恢复，但仍呈现半昏迷状态，且因鼻食而失语。每次探视，待他意识清醒时，我才能与他握握手，说些安慰的话。这时，江老的女儿江红也从加拿大赶回北京。他们姊妹每天轮流到医院去看护。据江红告诉我，大夫说江老体能比一般老人强，因此老人家慢慢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希望。江老失语，半昏迷，意识时清时失，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此情况下，每天又有众多亲人轮流看护，我探望的时间就时断时续了。但每次去时，还是像往常一样，向他转述一些他所关心的信息。他总是拉着我的手，专注地望着我，示意他听明白了。这样的状态又持续了一年多。其间，也有过反复，但基本维持这一状况。

这期间，有不少老友前往医院探视江老，有的还坐轮椅前来探视。江老的病情基本稳定，但对我来说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每次我去探视他时，他总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似乎要对我说些什么，深深地望着我，但又说不出来。到底他想说什么，要说什么，我至今不明白，猜不出。直到后来，他的意识逐渐减退，甚至完全消失，胃里又出现了癌变，常发低烧，还出现便血。11月28日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探视时，他已完全失去意识，仍不时便血、低烧，庆幸没有胃疼的反应。2012年1月15日，徐学会在科技会堂举行迎春茶话会时，江老的女婿和儿子出席并向学会领导通报了江老病危的情况，会后学会张会长、姚副会长、曲秘书长、老张分批前往医院探望。这位顽强与病魔抗争了一年多的老人，终于离开了这个他眷恋的世界远去了。

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兼学者

江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报

人，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才知道他的大名，这对一个也有几十年记者、编辑生涯的我来说，应该深感汗颜，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就让我从第一次耳闻江老的大名说起吧！

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后，从黑龙江回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国农民报》（即《农民日报》前身）。一开始，我在农民报科教部工作，后来调到总编室。在总编室除了负责一版编辑工作外，还负责报社好新闻评选工作。那时，首都新闻学会主管一年一度的全国好新闻评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是首都新闻学会会长，每年全国好新闻全国复评会，他都出席。我作为农民报评选代表出席全国复评会，便与他认识了，并进行了多次交谈。胡老是四川人，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便常与我交谈。交谈中，我才知道他是成都《星芒报》的主编。此前，我就知道《星芒报》是抗战时期中共成都地下党办的报刊，与当时著名中国共产党人车耀先办的《大声报》齐名（车被蒋介石政府在中美合作所杀害，是四川民众敬爱的革命烈士）。抗战胜利后，我参加成都反蒋学生运动，对车耀先的事迹就有所闻，也约略知道是胡老在办《星芒报》。这时，与胡老交谈中，才进一步弄清这两份报纸是成都地下党的前身成都民先队主办的（全名“中华民族先锋队成都部队”）。按胡老的说法，他确是《星芒报》的主要编辑，但当时并无主编或总编辑这样的名分，只是日子久了，大家就说他是主编了。胡老说，实际江老才是“星芒社”的负责人。江老原名蒋慕岳，“星芒社”即以蒋慕岳之名去办的登记证（即法人代表）。在党内，江老是《星芒报》的支部书记，江老还是成都地下党市文委的成员。胡老说，江老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星芒报》当时遇到不少麻烦，都是他化解的。胡老还说，后来江老还以成都青年记者协会太行支队队长的名义，带领成都新闻界的同行，到太行山前线进行战地采访，这对推动四川民众（包括军政界上层人士）支持、参与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在胡老处，我还进一步了解，筹办《中国农民报》原来是江老和冯老一同策划的（冯老即农民报领导小组组长冯诗云，抗战初期在成都时也曾是《星芒报》专栏作者、编辑）。后来，江老由国家外文局调《人民日报》编委会，负责筹办英文《中国日报》，胡老说，为创建《中国日报》，江老不减当年社会活动家的本色，四处奔走，网络人才，搭建班子，包括批地、建报社大楼等，很快就使该报社初具规模。看得出来，胡老对江老的评价是很高的。他们二位不仅彼此了解，而且感情深厚。这便是我第一次从胡老口中知道了江老的大名，包括一些相关情况的经过。从而也随之对他有了崇敬之意，并暗想不知何时才能亲识“庐山真面”！

事也凑巧，不久我就有了与江老面对面交谈的机遇。1983年秋冬之季，一天上午，我到报社领导冯诗云处拜访。谈话不长，江老也来拜访冯老。交谈中，我才知道江老、胡老和冯老三位常在冯老家聚会。当时三位都已年过花甲，都是四川籍的老报人。那时，我与胡老已比较熟悉，与冯老只在报社大会上远远见过，近距离交谈才是第一次，而与江老则是第一次认识，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地交谈。当天，江老文质彬彬，西装领带，带一副金边深度眼镜，额头光亮，和颜悦色，低声细语，俨然一位温文尔雅的儒雅学者风度，看不出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没有老革命、老领导的架子。谈时政、社会宏篇大论，谈私人家事却和风细雨，让人深感亲切。他听说我刚从四川参加父亲追悼会回来，便问了些我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情况，并致哀悼之意。还谈到当年我父亲曾为成都地下党帮了不少忙，表示感谢。我想到胡老告诉过我，江老曾是成都《星芒报》的党支部书记，便对江老说当年我父亲也是《星芒报》的忠实读者。中学时代我在父亲的书房就见到过整套的《星芒报》并翻阅。那次江老还问了些我在东北劳动以及回京后的工作、生活、家庭子女等情况。那时，江老已退居二线，由《中国日报》社长岗位转任顾问。他刚率报社工作组到美国考察回来，所以还对冯老说了些访美见闻之类的事。近